

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5年 愿月 · 天津

主 办 单 位：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会议协调人：俞可平 黄瑶平
谢寿光 高瑶健

会议工作组人员：
闫瑶健 佟德志
贾瑶俐 祝得彬 等

会议发言整理人员：
王晓博 王庆杰
米立峰 叶瑶萍 苟瑶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输可
平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97-2111-1

I ①中…摇 II 输…摇 III ①经济—问题—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摇 IV ①F12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456 号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 ——超越“华盛顿共识”

主 编 输可平等摇黄平摇谢曙光摇高健

出 版 人 输射寿光
出 版 者 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输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40 号
邮政编码 输 100029
网 址 输 www.skl.cn
网站支持 输 (CIP) 数据核字
责任部门 输编译中心 (CIP) 数据核字
电子信箱 输 skl@skl.cn
项目经理 输祝得彬
责任编辑 输祝得彬摇王晓蕾
责任校对 输林摇之
责任印制 输司摇非

总 经 销 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CIP) 数据核字

经 销 输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输市场部 (CIP) 数据核字
法律顾问 输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输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输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输 787 毫米×1092 毫米摇 1/16 开
印 张 输 12
字 数 输 25 千字
版 次 输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输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输 ISBN 978-7-5097-2111-1
定 价 输 25.00 元

摇摇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专题一 摇中国模式：背景与特征

◆ 摇主持人：谢寿光（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 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
- “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
- “中国模式”：如何理解

摇摇——从制度转型的视角



摇

主持人谢寿光：

这场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模式的背景和特征。总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想简要地说几句。在开幕式上，几位专家对我们会议的主旨已经做出了很明了的阐述。关于中国模式，或者是中国发展道路，或者是有没有“北京共识”，最近两年来，应当说已经不仅是成为一个学术话语，而且也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语。不少海内外媒体对于中国 30 年的发展，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内在的机制是什么，有过不同的观点和交锋，应当说，在面对这次讨论的时候，国外学者，他们的关注点甚至说是声音，往往比中国本国的学者还大，还强烈。包括“北京共识”这个问题，应当说是我们与会的第一个发言人雷默先生系统提出的。严格说起来，雷默先生长期从事的是媒体工作，最近才转向学术研究。这恰恰是一个公共话语的形成。而中国学者本身参与的不是那么高，并不是说明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或者是漠然，而是中国处于高速发展中，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中国要面对的转型的问题非常多，可以说来不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思总结提高提炼，应当说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就非常大了。

到 2008 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相信无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民间，更不用说是学术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将会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的这次会议，我相信它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也不急于达成什么共识，但是我们很希望能把所有



的问题，能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and 关注。到底有没有中国的模式，对世界的发展，到底是美国或者西方的道路，还是中国自身的道路，还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道路，还是有其他的标准，我想有很多的问题和话题是可以深入地讨论和研究的。希望大家，包括发言的同志，本着从学术研究的态度。我们这次不是一个媒体的争论，也不是以一个公共话语的争论，而是一个学术争论。可以进行交锋，但是我们紧紧围绕的是学术问题，注意少带一些情绪化的色彩来进行探讨。



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

(发言整理)

乔舒亚·雷默*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儿，我非常感谢俞可平教授和黄平教授的邀请和安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研讨的内容很有理论价值也很重要，就像俞可平教授说的，这次研讨会旨在思考用世界的眼光关注中国的发展。首先我想先感谢俞可平教授和黄平教授对我工作的帮助，其次很高兴看到傅士卓（~~允路清云~~ ~~傅士卓~~）等学者也参加这次研讨，使我有机会能和你们共同研究。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北京共识”也就是中国模式概念的由来，第二个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的一些议题，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我想我还会对这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这也是我近期研究不同学科领域的原因，我打算更进一步关注中国内部的问题，研究关于“北京共

* 乔舒亚·雷默（~~允路清云~~ ~~傅士卓~~），“北京共识”的提出者，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识”和国内相关研究的相互影响。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北京共识”的来源。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察，另一个是思考，通过观察我发现对于中国的印象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巨大的误解，西方政治学研究有个典型的说法叫“战争的烟雾”，用以形容“北京共识”就可以说是“变化的烟雾”。中国实际的改变步伐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困难把握（瞬息万变）社会上发生的变化，中国模式的基础的特点就是能够立即对问题产生反应，人们不断尝试发现新的方法以解决过去从未面临的困难，而这个基础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江泽民在著名的十六大报告中在 30 分钟内提到了 30 次“创新”，这是我们应该对创新加以重视的很好的证明。所以创新是解决快速发展而缺乏敏锐地感知的方法，我以前是记者，做过一些调查，所以我知道官方在网络治理方面应用这样的方法的经验。以上就是“北京共识”，也可以称为中国发展的新物理学。

在中国的外部同样存在和对中国内部问题一样理解的误区，这是我下一个主要的论点。在中国以外我感觉到人们关于中国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承认，但我还是认为在中国崛起和因特网迅速发展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在最早因特网出现的时候，也长时间有很多关于是该干预还是该隔离的讨论，但最终因特网还是证明了它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之外的人们在讨论是干预还是孤立中国也具有同样的感觉。我同时还发现国外的很多人的讨论还是基于“苏联政体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苏联政体研究”是人们分析苏联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研究上



层组织的领导，政治决策高层做出决定的过程。而现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沿用这种方法，这是我在关注国外研究动态时发现的很有趣的一点。

另外人们在谈论“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时还不够强调实事求是，人们以前从未看到这种快速的发展，对这种速度的反应就是按他们的需要而提出批评的理论，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一种框架，但并不涉及具体内容，这种框架不具有感情色彩，仅是对快速发展和竞争中产生的问题起到有效的整顿作用。

在中国内部同样存在问题，有些学者和政府行政官员对“威胁”的理解同样具有感情色彩，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他们也更多地关注与讨论“和平崛起”，这是在观察国家发展变化过程后得出的想法和答案，也是应对威胁理论的想法的来源。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翻译的问题，一些汉语里的词，例如“和谐”，还有俞可平教授提到的“和谐社会”，在英语里“~~和谐~~”有很多含义，和谐只是其中一个。“威胁”这个词同样，我认为在翻译“威胁”这个词时不是意味着中国要摧毁某些东西，我的意思是已经建立的稳固的国际秩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不得不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变化，我在写《北京共识》这篇文章时也注意收集各个国家研究关于“北京共识”这个想法的文献，他们很多都在朝着中国模式的方向发展，并且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毫无疑问地对原有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威胁”。

“北京共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华盛顿共识”的有用



的内容，我自始至终地观察了“华盛顿共识”，毫无疑问它失败了。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提供的发展道路，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中国，他们都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华盛顿共识”时，首先注意的是人们想找到最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第二，“华盛顿共识”缺乏对社会传统的继承的想法，没有关于其他国家该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建议，我认为正是这两点，中国才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经济发展的衡量过去依靠的是 **GDP**，这是黑色的 **GDP**，包括了转型时的误差、环境的损失、结构的不良影响等，所以只计算 **GDP** 作为标准的“华盛顿共识”不适应中国的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它只能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在中国居住的这段时间内，我在这里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像今天的主办方这样的人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研究资料和很多建议，他们建议我加深对社会的研究，多接触这里的人们对“模式”的想法和对不可思议的传统的依赖和政治上的挑战，我用了不长的时间阅读了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了解他们对于引进世界其他地方建设的经验来补充中国特色的理论，目前大多数学术思考都以研究中国特色为主导地位，比如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等，都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而我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说法是后中国特色社会，它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走向一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而中国会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分析国家发展问题的模式。

而且我认为时下在中国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具有了这种观点，“北京共识”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认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我们要在社会领域中进行创新，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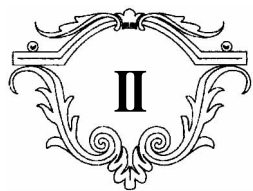


的转变，过去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蜕化，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经济最具创新性特色的领域——因特网领域，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的网络公司就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我们有中国**网易**、中国**新浪**、中国**腾讯**，去年又有了中国**网易**、中国**腾讯**，而这些都是源自美国的公司，这些都是因特网中有中国特色发展方式的证明，网络公司的想法是进行中国化，使公司具有地方特色而能继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中国的著名网络公司的出现使西方的公司要对他们加以分析，这些公司像盛大、灵通、**网易**等等，尤其是网络公司基本上可以说是网络信息中国化景象的代表，我这样的想法是想让人们明白你可以想像在其他社会领域中这种创新的能量也同样存在，意味着今天我们有着中国化景象的社会，这就是我认为中国**网易**、中国**腾讯**不仅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重要。但当你转一转整个国家时，你就会发现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中国化的盛大”就不会是很有趣的事情了，我在中国曾经采访过一位政府秘书，她不断地谈论创新的话题，但很少说到现实情况，从这儿可以看出人们的眼光集中在用创新、革新来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所以“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并不有效，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误解，这样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智力或思维的框架来思考这件事，这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研究这个领域是想要澄清关于因特网的框架无法适用于解释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如果我们回溯**1978**年，那时提倡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发展，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特色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是专家们为中国崛起而使用的想法；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后中国特色，它会是什么样子，“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



一种结构框架，简言之就是为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设计一个思想框架。谢谢大家。

(发言整理：王晓博)



“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

俞可平^{*}

“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 30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仅对于中国自己在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这表明，近年来关于中国的讨论受到国外舆论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 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

^{*}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来的失效，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 30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代价。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仅对于中国自己在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分析，对于“中国模式”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摇“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和外国的雄厚资本与先进科技，更需要它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入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管理制度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把它当作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表明了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这种时代背景的深刻认识。

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



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结合起来。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唯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条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

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逻辑力量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经成为全球的抽象。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但是，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市场失效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因而，公共部门同样要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维护



政府的强势地位，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

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为了避免剧烈社会动荡，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改革必须十分审慎。一方面，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简单的“休克疗法”不足为训，而应当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软着陆；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只是一味地缓慢进行，该突破时必须果断突破。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人们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并不是没有看到部分人的相对利益受损，而是看到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因改革而得到了明显增加，使每一个人的绝对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

二摇 “中国模式” 备受全球关注

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训。根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作为以相当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在未来发展中甚至会变得日益重要。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 繁荣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按照我的理解，作为执政理念和总体战略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全面进步或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领导人还是社会舆论，开始日益强调社会公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至少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如果说，善治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政治发展目标，那么，善政便是达到善治的关键。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